

[編者按]近年來，瑞士媒庫基金會（Media Tank）主席漢斯·伯樂（Hans Boller）熱衷於舉辦中西學者“一對一”的跨文化對話。2012年9月23—25日，德國哲學家恩諾·魯道夫與中國哲學家趙汀陽受邀在蘇黎世湖的半島進行了三天的無干擾對談，着重探討了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天下”觀念與康德的“世界公民”理念及其相關問題。下面兩篇短文是對話者撰寫的對有關對話觀點的解釋，也是給伯樂主席的彙報。經伯樂主席和兩位作者同意，由首都師範大學朱慧玲教授將英文稿翻譯成中文，交《南國學術》雜誌發表。

蘇黎世對話



恩諾·魯道夫/趙汀陽

[摘要]恩諾·魯道夫認為，從目前的趨勢看，“全球化”有可能是以一種和平方式的“世界中國化”，因此，中國的政治文化開始為將來的全球治理提出各種可行觀念，趙汀陽借用中國周代“天下”觀念引出的“世界性”就是代表。這種把原初的中國模式與德國康德的“世界公民”理想結合起來的想法，雖然是一種推動思想話語進步的創新，但這種“世界政府”的管理或許會類似於柏拉圖提出的“哲學王之治”，而不太可能類似於全球代議制民主。然而問題是，中國文化

如何成為“世界性”的？中國如何成為世界公民社會的一員？對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決定中國政治力量所擁有的機會和可能性。趙汀陽認為，全球化使世界面對着全球失序的問題，那種基於各國政治文化相似性的康德式和平，無法克服各文明之間的衝突以及其他全球性的衝突，而中國周代創造的“天下”觀卻可能是一種有效的世界觀念。它包含的政治意識有三：一是要成功解決世界性問題，祇能建立一種人們普遍認可的體制，而不是訴諸武力；二是祇有當世界體系制度安排能够惠及所有國家的所有人時，纔是正當的；三是祇有當世界體系能够保證所有國家和所有文化和平共生時，纔能良好運轉。“天下”觀念暗示着，最好的政治就是能够建立為所有人所接受的普遍關係。從“天下”觀念引申出的“世界性”是追求一種“和諧”，並不意味着任何的單邊普遍主義，也不像魯道夫教授所理解的是作為“和平的中國化”的中國文化攻勢。

[關鍵詞]中國 世界 政治與文化 “天下” 世界性

Title: Dialogue at Zurich

Abstract: Enno Rudolph thinks tha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trend, "globalization" may appear in a peaceful way of "Global Sinicization". Therefore, the political culture in China is putting all kinds of feasible ideas forward for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A typical example Zhao Tingyang used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worldness" is "Tianxia" (all-under-heaven) came from the Zhou Dynasty. Although the integration of primary China model and "World Citizenship" from Kant of Germany is an innovative idea promoting a kind of ideology discourse, this type of "world government" would resemble the concept outlined by Plato of a "reign of philosopher kings", more than that of a 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 at the global level. However,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China become "worldness" and how

capable is China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world citizens?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will determine the probability and likelihood of the degree of political power that China possesses. Zhao Tingyang thinks that globalization exposes the world to the problem of global disorder. The Kantian peace which depends on cultural similarity of states is unable to overcome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s well as other global conflicts, yet the concept of "Tianxia" created in the Zhou Dynasty may become an effective idea around the world, which includes three types of political awareness: (1) successful solutions to the world-size problems should resort to a universally acceptable system rather than by force; (2) a world system is justified only if it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benefit all peoples of all nations; (3) a world system works well only if it creates harmony of all nations and all cultures. The concept of "Tianxia" implies that the best way of doing politics is to establish relations accepted by all. "Worldness",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concept of "Tianxia", pursues harmony, not implying any unilateral universalism nor it is a Chinese cultures strike of the "peaceful sinicization" as what Professor Rudolph thinks.

Keywords: China, world, politics and cultures, "Tianxia" (all-under-heaven), worldness

“天下”抑或“世界性”：採取攻勢的中國政治文化

[德國]恩諾·魯道夫

(盧塞恩大學，瑞士盧塞恩)



在中國，人們可能已經知道“全球化”將會引向何方——可能是以一種和平方式的“世界中國化”。其實，中國早已在影響歐洲。這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影響是開闢了市場。目前，商業合作仍在不斷擴展，也對歐洲形成了競爭的壓力。第二個階段的影響是旅遊業。這一影響是廣泛而持久的，也是成功的。第三個階段的影響將走向文化。走到這一步，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其發展是最難以預測的。這第三階段纔剛剛開始，政治閘門將一發而不可收地持續開放。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並沒有陶醉，那些政治精英們則在不停地思考怎樣在世界市場中成為更出色的博弈者（對於這一點，在許多西方人看來，這開始變得有些危險了），而那些文化創造者們也獲得了更多的行動空間——祇要他們能够有效而不出格地利用這一自由，就不至於招惹麻煩。實際上，他們現在在某種程度上已獲得了一種根本性的自由，而這種自由通常被認為是與“非自由”國家存在所需的條件是不相容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世界知名哲學家、倫理學家和全球化理論家趙汀陽知道怎樣巧妙地而且富有想象力地利用這一“生態環境”（儘管外部世界仍然不够重視這個“生態環境”）。他基于對歐洲歷史和美國政治哲學的那種百科全書式的瞭解，一直在與西方的同行們不斷地提出新的討論——相信這些討論還會持續下去。由于對從傳統儒家至毛澤東（1893—1976）思想的中國多元文化和各種傳統的熟練掌握，趙汀陽能夠指出中國的哪些主要傳統與西方的重要傳統之間所具有的某些驚人的類似或相似，從而在不同文化之間開啟交流之門，而那些文化的門檻原本可能會被人們忽略而沒能跨過。

趙汀陽研究思路的關鍵詞是“天下”。這是一個古老的中國式隱喻抑或是一種功業，大概意指“我們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追溯中國文化發展的源頭來看，這一原則指

的是這樣一種意識：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有一種人類物種所特有的普遍關聯性，我們現在可以恰當地把這種人類學的先天性稱為“全球化意識”；或許更好的說法是，一種全球團結的精神。這種意識及其伴隨而來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感性。相關的資料已經證實，這真的是一種中國意識；它同時又被看作是人類性的特徵，或一種人類意識。趙汀陽認為，這一意識與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έλης, 前384—前322)把人定義為政治動物有着某種遙相呼應。然而，他認為，歐洲人已經忘記了其古希臘的源頭。如今，歐洲人顯然可以途經中國而找回它的餘緒。

為了把中國的範例作用與中國文化所具有的潛在教化功能聯繫起來，趙汀陽教授作了幾個美妙的類比：不僅把“天下”與亞里士多德做比較，還把“天下”與他加以質疑的康德(I. Kant, 1724—1804)做比較。排列與類比，這些都是方法。新舊特徵在這裏被平等地加以衡量。然而，一個關於中國、遠東地區與歐洲、北美地區之間的差別問題迅速顯現出來：中國人是以相互關聯為“在世”意識，並業已在“在世”上實踐了互相關聯的生活；而西方人則是互不牽挂地獨自生活；中國人的“在世”以“共在”先於“存在”，而西方人則與之相反。

同樣大膽的比較還有在毛澤東和卡爾·施密特(C. Schmitt, 1888—1985)這兩人之間進行的比較。一方是中國革命的領導人，他的歷史重要性在中國是劃時代的；另一方則是德國激進的國家專權論的倡導者，20世紀30—40年代曾一度成為“第三帝國的法理學家”。的確，毛澤東的那篇重要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在20世紀20年代完成的，它與身處歐洲的卡爾·施密特的著作《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1927)有着類似的假設和差不多的歷史影響力，都把“朋友”和“敵人”作為社會和政治常數的兩分法看作是政治的起點。然而，施密特將識別敵人的意識看作是既定的而不可超越的，并認為這是所有社會的普遍公理，因此典型地表達出真實的西方自我意識；而毛澤東則指望最終能够克服這種兩分。施

密特構造了一種對抗的存在論，而毛澤東則表達了一種友好的末世論。施密特的成功祇是屬於精英們的——從20世紀30年代至現在都是如此；而毛澤東的成功則屬於普通大眾——儘管其功效日益衰減。施密特以法律的名義打破了法律，而毛澤東則通過創造連續性而得以立法。由此看來，以中國方式行事就意味着克服對抗，不像馬基雅維利(N. Machiavelli, 1469—1527)、托馬斯·霍布斯(T. Hobbes, 1588—1679)和卡爾·施密特教導西方人的那樣，做事總是離不開對抗性。在這一點上，西方人是伏擊者，而中國人卻是迎賓者。

從中國文化中，人們可以看到它有能力發展出一種全球化意識所真正需要的親和力，這成為當前人們熱議的話題，趙汀陽將其稱為“世界性”(worldness)。這是一個神奇的



最早刊登《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的《革命》雜誌



《政治的概念》（德文版）

詞語，它試圖克服任何一種基於民族性的狹隘思維。對於那些倡導西方文化的人，尤其是具備某些哲學知識的人而言，這個詞語會使人聯想到康德的詞彙，如“世界公民”、“世界公民權利”等等。誠如趙汀陽所指出的，這些詞彙的確是表明西方觀念與世界問題具有真實聯繫的恰當例子。然而，他在承認康德為實現一種包容性的世界和平構建了以道德為基礎的世界公民身份理論的同時，又認為這還不是一種具有融貫性的思想。他的看法是，德國啓蒙運動哲學家終結於民族國家體系，而今比以往更加需要的是一種“世界國家”。

正是在這裏，我們的討論觸及了神經的痛點——不僅僅是來自趙汀陽的想法，也是來自中國政治的一種可能策略選擇：既然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就意味着必須為將來的全球治理提出可行的觀念。然而，“世界性”與“民主”可能是相互排斥的。儘管趙汀陽也嚴肅地表達了這種警告，但他試圖削弱這個問題的威脅性，因為他嚴格地將“世界性”限制於這樣一種可能性：祇有一個萬民心向的政府，亦即在康德“世界公民”意義上的“世界社會”裏，纔有可能保持世界的長治久安。這種“世界政府”的管理或許會類似於柏拉圖所提出的那種“哲學王之治”，而不太可能類似於全球代議制民主的觀念。因此，“世界性”並不是反民主的。“世界性”這個術語提示着人們，人性在每個人身上有着不同的體現，人們不能也不應該以民族國家的模式去思考人性。趙汀陽的“世界性”觀念完全不同於法國民主主義者雅克·朗西埃(J. Rancière)意義上的“後民主式”社會。後者描述的是“後民主”社會條件的特徵：儘管民主結構的機制是可操作的——有選舉、候選人、議會代表等等，但那些機制已經蛻變成脫離人民掌控的決定論僵化程序。與此相反，對趙汀陽而言，他的“世界性”要求在“同在一個天空下”的所有人一致同意的基礎上，參照經典的中國模式——也不一定完全按照經典模式，而為能够管理好世界的精英們創造一種必要的合法性。

毫無疑問，趙汀陽的看法源自一種根深蒂固的希冀和平的意願，也與對“和諧”的強烈需要密切相關。這種把原初的中國模式與西方主要是歐洲尤其是德國傳統的理想結合起來而使之更新的明顯意圖，讓我大為驚訝，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看來，把“諾貝爾和平獎”授予歐盟似乎就是一種天意。這種把原創性、傳統性以及合時性融於一身的努力，已經有足够的理由將其視為推動思想話語創新的貢獻。然而，它涉及愛國主義和西方烏托邦理想的筆墨並不多。

最後，我要提出的問題是：中國文化如何成為“世界性”的？中國如何成為世界公民社會的一員？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決定中國政治力量所擁有的機會和可能性。如今，已經沒有人再低估中國政治的力量，它將發展成一種全球性的、包含中國文化元素的綜合性力量；它將反對西方的卡爾·施密特，而與西方的伊曼努爾·康德一起在世界歷史中（或至少是在思想界）進行一次非常吸引人的實驗。

[恩諾·魯道夫（1945—），男，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瑞士盧塞恩大學名譽教授、高級研究員，主要從事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 *Ernst Cassirer im Kontext: Kulturphilosophie zwischen Metaphysik und Historismus; Odyssee des Individuums: Zur Geschichte eines vergessenen Problems* 等。]

尋找跨文化的“聚點”

趙汀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 哲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令人心曠神怡的林中小路，引領一位富有智慧的德國哲學家恩諾·魯道夫教授與我一道走遍蘇黎世湖半島的每個角落，並激發我們從歐洲和中國觀念出發來探索哲學的路徑，以通向我們現今所生活的世界以及可能到來的未來世界。這是一次哲學上的冒險：我們屬於不同的文化，但必須努力去找出跨文化的“聚點”(focal points)。這裏我要借用托馬斯·謝林(T. C. Schelling)對“聚點”的解釋：當人們缺少足夠明確的信息時，“聚點”是人們最可能不約而同而得以會聚的地方。這似乎正是我們試圖去做的。

相似性不一定就能夠保證產生聚點，也未必就是一個好的聚點。在我們的對話中，有件事情讓我們都覺得很有趣，那就是：毛澤東在1925年發表的那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分清敵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個觀點似乎與卡爾·施密特1927年在《政治的概念》中提出的“政治就是識別敵友”的著名理論不謀而合。不過，在面對敵人的挑戰時，毛澤東在理論上主張的解決方式是團結盡可能多的人，甚至將敵人變成朋友（儘管在他後來的實踐中也並不總是如此）。

“化敵為友”是中國傳統政治思維的一個原則，它在實踐中也經常是一種成功的策略。它被假定是通往全人類普遍“和諧”的步驟，而這裏所謂的“和諧”指的是“最佳的共存狀態”(optimum coexistence)。正如這個概念所表明的，“和諧”並不意味着任何一種單邊普遍主義，並不像魯道夫教授所理解的那樣是作為“和平的中國化”的中國文化攻勢——彼得·卡贊斯坦教授(P. Katzenstein)在他的《中國化和中國的崛起》一書中也討論了這個問題。與此相反，“和諧”意味着邀請所有文化都進行“重新培育”，借助於其他文化觀念而獲得相互更新或互相豐富，並由此能够成為相容的文化。

中國哲學已經感受了歐洲的觀念並從中受益良多。例如，借助於引進的“先驗”和“超驗”的觀念，中國哲學已經感受到超驗哲學這一視域的妙處，並能更好地理解那些原本在中國哲學中所沒有被澄清的問題。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康德在中國會得到至高崇敬。在談話中，我向魯道夫教授請教了海德格爾(M. Heidegger, 1889—1976)的“在世之憂”(sorge)的觀念，它與中國人的存在經驗的重點稍稍有些不同。與“此在”(本質上是自身關切的存在經驗)對“在世之在”(being-in-the-world)狀態的關心不同的是，中國哲學強調的存在狀態主要關心的是“處世關係”(relatedness-to-the-world)或“與世共在”(or being-with-the-world)，關心如何能夠與自然和他人和諧共處的存在感。

此處我要着重說說“關係”思維，它可以引出一些有意義的觀念。關係理性應該是人類理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很可能可以解決或減少個人理性(霍布斯和大多數現代經濟學家或政治科學家所承認的那種理性)以及交往理性(哈貝馬斯所提倡的)所難以解決的

問題。現代人重視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忽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可是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係其實可以保證並且促進每個人的利益。個人理性更多地製造了而不是減少了衝突；交往理性雖有所願卻無法保證和平與合作。良好的共在狀態祇能由良好的關係所創造並加以維持。人們不會僅僅因為被告知了一種規則就去遵守它，除非經過關係理性的慎思。關係理性的要點是將相互傷害最小化而不是個人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實際上，相互傷害最小化正是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一個必要條件。可以說，由“關係”所定義的現實纔有可能確保和平。

“關係”思維是理解中國政治文化的關鍵。在“關係”視野中，政治理性與政治合法性的有效單位是“家、國、天下（世界性的政治體系）”，此種關係性的政治單位與西方的“個人、共同體和國家”的政治單位形成犬牙交錯的互補。作為一個規模更宏大的框架，關係性的存在單元也引入了更寬廣更深遠的政治問題，而這些問題不可能在現代民族國家和國際政治的框架中得到解決。從現代性到全球性，這個世界見證着巨大的改變。全球化使世界面臨着全球失序的問題，而這種問題卻無法通過國際博弈策略去解決。諸如，實力均勢，避免相互毀滅，遏制、制裁以及貿易保護，等等。因為，所有這些策略都祇在存在着足夠獨立的國家利益和安全的條件下纔是有效的。換句話說，那些策略祇在國家有着全方位的“邊界”的條件下纔是有效的。可是今天的情形是，“國家”事實與“國際”事實正在變得界限模糊不清，而跨國的經濟力量、媒體力量、政治力量、全球網絡及市場正在一起超越現代國家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的邊界。全球化未必預告了可怕的災難，而是宣告了一種吉凶未卜的新遊戲。在其中，我們不得不更嚴肅地考慮世界利益以及世界性的問題，因為世界性的問題甚至比國家問題更嚴重。

中國先秦時期的哲學家墨子（前468—前376）就預告說，除非整個世界是有序的，否則沒有一個國家能够享有可靠的秩序與安全，甚至衆多良好有序的國家的相加也未必能够形成一個和平的世界，因為仍然存在着不可讓步的國家利益而可能導致利益衝突或各國之間的不合作。^①墨子似乎早就預見了聯合國或歐盟的局限性和低效性。雖然聯合國和歐盟為了和平而做出了值得尊敬的努力，但它們畢竟與全球性的問題不相匹配。目前這種挑戰性的形勢，更準確地說是“失效世界”而不是“失效國家”。這個失效世界主要歸咎於不適應全球化的現代思維方式所導致的不可控制的全球危機。問題在於，全球化捲入了所有地方、所有民族、所有文化以及所有的權力，放大並加劇了一切新舊威脅，使它們像瘟疫一樣傳播，從而加劇了世界的無政府狀態。在這樣的亂世中，世界人民根本無法採取理性的集體行為，任何國家也難以獨善其身而免於危險和混亂。全球化本身就是悖論性的：全球化的規模波及整個世界而卻尚未存在一個整合的世界——物理存在的世界尚未成為一個政治存在的世界，所以說，這個世界在本質上是個“非世界”。

秦國的丞相呂不韋（前292—前235）進一步解釋了非世界的危險性：“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②不幸的是，如今我們這個世界正在目睹發生於諸多地方的此類情況。這表明，國家和國際政治的方法論已經無法應付全球性的挑戰，因此，我們需要新觀念去理解世界的世界性。看來，老子（前580—前500）的建議是正確的：“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③

“天下”就可能是一種有效的世界觀念。它是關於“世界”的一個深厚觀念，由三位一

^① 參見《墨子》（北京：中華書局，1986）中的“尚同”、“兼愛”、“非攻”等篇。

^② 《呂氏春秋·諭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③ 《老子道德經》（上海：中華書局，1936），第五十四章。



體的含義所組成：一是指天空下的這個物理世界（這是日常意義）；二是指心理世界，體現為世界上所有人的公共選擇，也就是民心，即人心普遍同意的世界（這是儒家的解釋）；三是指政治世界，即一個屬於世界又服務於世界的普遍政治體系，它要擔負起普遍秩序、共同善、正義和世界和平。中國周朝的制度就是這種政治體系的一個實驗。

周朝在公元前11世紀就創立了這樣一種前衛的世界體系。根據《尚書》的記載：當時商朝是所有部落聯盟的首領，作為小邦的“周”反抗商朝暴政並侥幸摧毀了商朝的强大軍隊。周雖然確立了領導地位，但卻面臨一種史無前例的政治難題。據說當時中國約有一萬多個部落，而周的本族人口不足七萬。這與多文化、多種族的衆多部落（尤其是“商”擁有的一百萬人口）相比，人口數量顯然是很小的。於是出現了一個挑戰性的問題：如何以小治大？這個異乎尋常的境況的關鍵在於排除了通過武力、霸權或單邊主義來實現統治的可能性，而祇剩下一種邏輯上的可能性，即通過創造一種具有和諧關係的制度來進行統治。於是，世界政治就凸顯為主要問題。周朝的統治者們（主要是周公姬旦等人）創立了普遍政治的“天下”制度，它包含衆多具有自治權的諸侯和一個核心政府，其中包含這樣的政治意識：第一，要成功解決世界性的問題，祇能建立一種人們普遍認可的普遍體制，而不是訴諸武力；第二，祇有當世界體系的制度安排能够惠及所有國家的所有人時，它纔是正當的；第三，祇有當世界體系能够保證所有國家和所有文化和諧共生時，它纔能良好運轉。“天下”觀念暗示着，最好的政治就是能够建立為所有人所接受的普遍關係。這要好過設立每個人所接受的個人邊界。

我對“天下”觀念的重建也是對亨廷頓（S. P. Huntington, 1927—2008）的“文明的衝突”問題的回應，也是一種關於永久和平的新理論。那種基於各國政治文化相似性的康德式和平，會遇到亨廷頓問題的挑戰：該如何安置具有不同文化或價值觀而被看作是“非自由國家”的其他國家？結果似乎可能是：那些具有別樣價值觀的國家就被看作是不合法的並因此被排除在“永久和平”的康德式社會之外。康德理論因此也就無法克服文明之間的衝突以及其他全球性的衝突。可見，世界祇有成為“天下”，纔會有永久和平。

我無法回答魯道夫教授提出的一個極有意思問題：未來哪個權力將領導這個新天下？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還是像德國這樣的中型國家，還是像瑞士這樣的小國家？我想，一切皆有可能。我祇看到了未來世界的理念，但卻無法預見各個民族的天命。

〔趙汀陽（1961—），男，廣東省汕頭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長城學者”，主要從事存在論和政治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天下體系》、《論可能生活》、《壞世界研究》、《第一哲學的支點》等。〕